

# 東正教會在義和團事件中的殉道史

Dionisy Pozdnyayev 著 陳愛潔譯

（編者按：本文為東正教會 Dionisy 神父於六月十四日在「義和團運動與中國基督宗教」研討會上發表之演說，極具代表性；特此選刊以饗讀者，由於所用資料皆為俄文，而中文資料原件經已散佚淨盡，因此中文名字及地方皆以英語拼音刊出，敬請讀者注意。）

義和團（歐洲人稱他們為「拳民」，皆因他們配戴著紅色徽章的圖案且緊握著的拳頭），他們的起源並不清楚的。中國歷史上有很多秘密社會，也

發生多次叛亂。至於義和團的特徵，就是他們對於「洋鬼子」和本地做「洋鬼子」傀儡的人懷有不能遏止的恨仇，甚至不惜一切來消除他們。

義和團於一八九九年大肆擴展。拳民興建廟宇，祭獻本地神明偶像，還舉行一些使人進入催眠狀態的禮儀，跟現代的術士和新紀元信徒所進行的儀式大同小異。義和團的隊伍主要是由農村的年輕人組成：士紳從不參與其中，但對他們通常表示同情。觀察員看見拳民竟是那麼年輕，都感到震驚；相反地，慈禧太后卻歡迎「兒童廣泛參與救國滅洋

的行動。」非常重要，由始至終，反基督宗教一直是義和團思想的支柱，因為義和團思想的本質和表現都是宗教性的：他們的宣傳企圖說服人們相信古代的神祉因為不滿外國宗教的惡行，所以已遠離他們。除了把洋人形容為傲慢、挑釁、愚蠢等熟悉的形象外，他們更荒謬地指控外國人食人、虐待兒童，甚至「在井水中下毒」等。

至於義和團有沒有把拯救國家擺脫清朝統治作為目標則不甚清楚，原因是「扶清」和「反清」這兩個互相矛盾的訴求同時出現。朝廷本身也不是一致的：雖然在朝廷有很多人同情義和團，希望他們能遏止列強「瓜分國土」，但官方的政策卻是保護外國傳教士，並制服這個日益強大的暴亂，直至一九零零年春季才有所改變。

然而，到了一九零零年六月，暴亂已淹沒鄉間，更蔓延至京城。當時的使館區擠滿外國難民和他們的家人，而使館區本身亦被圍困。本來有一支聯合部隊由天津來拯救他們，但遭拳民擊退。慈禧

太后聽到這個消息，認為可要求採取行動，於是命令軍隊支持義和團，拘捕和殺死所有懷疑與外國人連繫的大官，並向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意、奧、匈、美、日等國宣戰。地方官員原先一直猶豫不決，甚至企圖抵抗義和團的，但現在卻支持朝廷，而且在某些地方，已開始消滅基督徒。

有人認為，義和團之所以成功得很快，是因為旱災之故。據說，迷信的農民不能開始幹活，而且面臨必會發生的飢荒，便向「洋鬼子」發洩他們的憤怒，因為這些外國人要對旱災負責。然而，這種說法不足以清楚解釋。首先，沒有聽聞在中國發生旱災（而朝廷通常能控制災情，由其他省份送來糧食）；其次，一九零零年的旱災並不持續很久，到了六月，土地經已有足夠水份，而且，義和團之亂的很多可怕的暴行都是在傾盆大雨中進行的。

戰事向東北蔓延。當時，俄國人正在那裡修建中東鐵路。阿穆爾地區（Trans-Amur District）的軍隊受到清兵和拳民攻擊；哈爾濱被圍攻，造成

大量士兵和平民傷亡」。

築路工人遵從瓦勒斯基 (Valevsky) 中尉和工程師費爾霍夫斯基 (Verhovskiy) 命令，從穆爾坦撤退。但他們的命運是悲慘的；大多數人在戰爭中喪生。費爾霍夫斯基則被俘虜和斬首。……

在莫斯科 Piatnitskoe 墳場裡，豎立了一座小小的紀念碑。碑上刻著「鮑里斯·阿列克謝耶夫·費爾霍夫斯基，一八七三至一九零零年。」另一處刻著「鐵路工程師主管費爾霍夫斯基，一九零零年七月在滿洲遼陽被中國拳民殺害，遺體於一九零一年運返俄羅斯，並在此石碑下安息。」

如果這墓碑能在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歲月中倖存，那麼，它可能是俄羅斯領土上唯一的紀念碑。在俄羅斯東正教在華傳教史，其中鮮為人知的，就是義和團之亂的一九零零年，不僅是中國歷

史命運重要的一年，也是俄羅斯教會傳教的分界線。義和團之亂是針對外國人的，其主要思想是反基督徒的。首位東正教中華殉道者 Mitrofan Ji 的兒子，謝爾蓋·張神父 (Sergiy Chang) 這樣描寫義和團：「這個團體擁有共同的生活，並相信有關超自然力量的信條，其觀點是強國滅洋……不但國外人被稱為惡鬼，已領洗的中國人也被稱為惡鬼的兒子，連跟他們有連繫的非基督徒也被稱為惡鬼的次子；人們視義和團為天軍。」

義和團在各處興建廟宇，焚燒祭品。直至一九零零年春天，中國當局一直保護外國的傳教團，但到了夏天，他們下令軍隊支持為義和團籌募資金。凡是懷疑與外國人連繫的官員都遭處決。來自各省的外國人走到北京，在城南的大使區尋求援助。當暴亂波及首都時，俄羅斯東正教傳教團團長英諾肯提乙·費古洛夫期基修士大司祭 (Innokenty Figurovskiy) 及傳教團的其他成員已離開北館，並遷入俄國大使館。他們只攜帶了一個於一六八五年

從阿爾巴津(Albasin)帶來的古老的聖尼古拉聖像畫以及一些珍貴的教堂器具。

中國政府派出十名士兵來保護傳教會，但是在六月十一日那天，傳教站已被完全燒毀，包括圖書館、檔案室，以及祭衣房。拳民折磨了二百二十名中國東正教徒，他們也因此成爲首批中華殉道聖人，當中包括殉道的 Mitrofan 神父，他是首位華籍東正教神父，在日本由聖尼古拉主教授予聖職。在傳教團團長的要求下，根據神聖主教議會法令第二八七四條規定，由一九零二年四月廿二日開始，慶祝中華新殉道聖人慶日。他們的聖髑安葬在一座爲紀念他們而祝聖的「殉道諸聖堂」墓園裡。他們當中有很多遺體看來是不會腐爛的。

以下有關北館被毀滅的描述摘自謝爾蓋·張神父所著《中國殉道宣福資料》，他是這些可怕日子的見證人。在五月中旬，拳民在東定安村焚燒一座東正教堂和學校。五月廿六日，張神父從東定安村來到北館，並向俄羅斯傳教團團長匯報事件。

依諾森(Innocent)院長聽過我們的講話後，立刻致函俄國大使。翌日，大使來到北館，說服所有俄國傳教士遷往受到保護的大使區。大使認爲自己有責任堅持這個建議，以免傳教士冒著生命危險。鑑於中國政府似乎保證他們財物的安全，因此，傳教士準備驅車離去時，只檢查財產目錄。除了一個古老的聖尼古拉聖像畫外，他們沒有帶走任何東西。下午六時，傳教團團長英諾肯提乙·費古洛夫斯基修士大司祭以及瓦斯里·斯克里扎林(Vasily Skrizhalin)執事已驅車往大使區的 Sretenskaja 聖堂。隨後，我們居住在傳教站四周的基督徒開始逐步離開，他們當中有些人往城南的親友家中，其他人則往城中其他地方的樓房。這些日子開始流傳謠言，說傳教所會遭焚毀。

這些日子，即五月十三日至廿七日，有關拳民的謠言越來越迫近。街頭顯然又活躍起來，

貧窮和無家可歸的人、外地人士紛紛出現。拳民的手腳縛著紅色帶，開始安全地出現在街上，經過人群和軍隊。然後，有些人企圖乘坐牛車前往大使區。有一人被拘留在德國大使館。在五月十七日黃昏，即俄羅斯東正教曆法卅一日，下午八時傳教所的建築物開始起火。這時候的北京城到處都是火光熊熊，彌漫著恐怖、呼喊聲和呻吟聲。在當天晚上，數以百計的拳民由農民和乞丐陪同下，逐漸走近北館。拳民按照受訓的程度，主要分成三個級別。他們相信每個中國人依從君主的權利，分爲公侯至平民百姓，所以，這些屬於三個最高程度的拳民是刀槍不入的。他們不需要用火來焚燒建築物，只要指著某座建築物，便足以使它著火。他們號召眾人喊叫「殺呀！（殺死基督徒！）」，當時顯然沒有人不嚷著「殺」的。

早上九時，從城南帶來訊息，拳民很快便會

來到。我於是通知基督徒家庭。……恐懼迫使人集會。我跟著超過三十人，並且從南面城牆的東北角經過。我們很快看見一群人從南面走向北館，他們手持著燈籠和火把。拳民抵達前，朝廷的護衛軍在傳教所四周開槍，然後聯同一些外人一起趕往洗劫北館的教堂，然後放火。……我們來到東直門街，那裡的士兵安慰我們，表示後悔消滅基督徒，至於東正教基督徒來到京城這裡，不是出於自願，而是在滿清管治初期被俘虜來的。由早上八時至十一時，可聽到人們嚷著要毆打基督徒。到了中午，一切已逐漸緩和下來，我們也返回北館附近的家。當時火勢仍很厲害，……看見這樣的情景，我們感到震驚，於是祈禱，覺得因我們犯了罪，所以上主容許教堂被焚燒。直至早上，我們都聚在一起，唯有在黎明時，人們才散去，返回自己的家裡。

傳教團團長英諾肯提乙·費古洛夫期基修士  
大司祭，即後來的主教，和亞巴郎(Abram)修士  
司祭用以下的話來見證東正教殉道者的殉道：

對大多數中國東正教徒來說，一九零零年六月十一日是受懲罰的日子。在那一天前夕，街上張貼了傳單，要求屠殺基督徒，並威脅如果任何人敢窩藏他們，必定被殺。在午夜時分，手持火炬的拳民散佈整個北京，襲擊基督徒的房屋，捉拿基督徒，強迫他們否認基督。有些人因害怕酷刑和死亡，爲了換取性命而確實放棄了信仰，並向偶像燒香。其他人則無所畏懼，宣認了基督。他們的命運是駭人聽聞的。他們被折磨、斬頭，甚至活活被燒死。在那一天以後，拳民繼續搜尋基督徒，殺害他們。基督徒的房屋遭拆毀，人們被帶到城外，義和團興建的廟宇，然後受盤問，並用火刑處死。

甚至連非基督徒的旁觀者也承認，中國東正教徒以令人震驚的勇氣面對死亡。東正教傳道員 Paul Wang 死時口裡還在祈禱。傳教所的老師 Ia Wang 兩次忍受殉道。在第一次，拳民用劍砍她，並把她燒得半死。有一個並非是基督徒的侍隨，聽見她呻吟，於是把她抬到自己的茅舍。拳民在那裡再次捉住她，把她折磨至死。在兩次經驗中，Ia Wang 都在折磨她的人面前熱切地宣認基督。

在那些爲基督而死的人當中，包括阿爾巴津人，他們的祖先於一六八五年首次把神聖東正教的光明帶到北京。現在，他們的信仰因其後裔的殉道而受到光榮。阿爾巴津人 Clement Kui Lin、Matthew Chai Tsuang、他的兄弟 Witt、Arna Chui，還有很多人，都無懼那些「殺害肉身，而不能殺害靈魂的」(瑪 10:28)，以勇氣面對痛苦和死亡，爲折磨他們的人向救主祈禱。

在所有中國東正教殉道者當中，最著名的就

是 Mitrophan Ji 神父和他的家人。他生於一八五五年，廿五歲那年由日本的聖尼古拉主教施洗。Mitrophan 爲人害羞和沉默寡言，祥和而謙遜；甚至面對嚴重的侮辱時，也從不力求替自己辯護。他本來不願意當神父，說：「我是一個無德無能的人，怎敢接受這重大的職位？」他在弗拉昂(Friavian)修士大司祭和老師的鼓勵下，最終同意，但仍知道鐸職生活永不給他帶來快樂的。他在弗拉昂修士大司祭的權下服務，幫忙翻譯及校對禮儀書籍。十五年來，他一直孜孜不倦地事奉天主，忍受很多痛苦，以及來自四方八面的侮辱，最後更突然患上精神病。自此以後，他移居到傳教所外的地方，領受一半薪金作爲退休金。Mitrophan 神父爲人慷慨，常被人佔便宜。

一九零零年六月一日（即農曆五月十七日）晚上，拳民在傳教所放火。部份基督徒爲了尋求庇護，於是聚集在 Mitrophan 神父家裡。在他們當中，包括那些昔日曾傷害過他的人，但他並不介意。當

他看見有人陷於失望之中，便嘗試鼓勵他們，聲稱苦難的時候已來到，而且是很難避免的。他每天總會出去數次，看看教堂原址上的灰燼。六月十日，約下午十時，士兵和拳民包圍他的屋。當時約有七十人在裡面；有些較強壯的人跑掉了，留下來的——包括 Mitrophan 在內，但大部份是婦孺——全都殉道了。他坐在庭院；拳民用刀把他的胸口刺得像蜂巢一樣，他最終倒在棗樹下。

鄰居把他的遺體拖到傳教團收容所的原址。其後，亞巴郎修士找到他的遺體，並在一九零三年，當首次慶祝新殉道者慶日那天，連同其他遺體一起埋葬在殉道諸聖堂的祭台下。一九二零年代，在他被殺的地方豎立了一個十字架；在殉道諸聖慶日那天，信衆遊行到那裡舉行紀念儀式。

Mitrophan 神父有一位妻子，名叫 Tatiana Ji，以及三名兒子：最年長的是 Isaiad，次子 Serge，即現任的總鐸，以及 John。在六月十日晚

上，Tatiana 在兒子的新娘的幫助下，逃過拳民的

注意。但是，在翌日早上，她與其他人一起在現時濟貧院的地點被斬首。至於當年廿二歲的 Isaias，曾在軍隊服役。由於人們發現他是基督徒，所以他於六月七日在平則門附近的大街遭斬首。他的新娘，即當年十九歲的 Mary，在大屠殺前兩天來到 Mitrophan 那裡，願意在新郎的家裡受死。Isaias 的弟弟 Serge 曾二次勸告她離開和躲藏，但她拒絕，說：「我在天主之母堂附近出生，我也將在這裡死去。」當士兵和拳民佔據該處時，她在極難受的死亡中找到安息。

當年的 John 只有八歲。六月十日，當他的父親被殺時，拳民砍傷他的肩膀，並砍掉他的鼻子、耳朵和腳趾。Isaias 的新娘把他藏在外屋，幫他逃過死亡。當人們問他是否感到疼痛時，他卻回答，爲了基督受苦，並不感到疼痛。兒童譏笑他……John 向鄰居要求喝點水，但他們沒有給他，還驅趕他。當時還未領洗的 Protasios Chang 和 Irodion Tsui，證明目睹 John 的肩膀和雙腳受傷。傷口有

超過一吋之深，但他似乎不覺得痛楚，而且再被拳民捉住時，表現得毫不畏懼，甚至穩步前行。有一個老人抗議說：「這男孩子犯了什麼錯？唯有埋怨他的父母使他成爲惡鬼的門徒吧。」別人嘲笑他，嘲弄他，或僅僅咧嘴譏笑他。因此，他被領去，猶如被牽往祭獻的羔羊。

二十世紀初，中國的新殉道聖人在俄羅斯受光榮：正如上文指出，在一九零三年，經已舉行敬禮他們的禮儀。他們的紀念日，就是北京的基督徒受大屠殺的首天，即六月十一日（公曆的六月廿四日）。其後，在他們安葬的地點興建了一座教堂。

現在，一切看來都截然不同了。北京的俄羅斯東正教傳教所不復存在。它的部份物業，包括美麗的公園，一併移交俄羅斯（前蘇聯）大使館。當時，在赫魯曉夫時代，蘇聯外交使節拆毀了這範圍內的教堂。以下是一位俄羅斯人最近遊覽北京時寫下的旅遊筆記……

我們的駐北京大使館是全球面積最大的大使



館，並以其賞心悅目的景色見稱。四周被清澈的運河環抱著，中間還有一個大湖……我最喜歡的地方是島上的遊樂場。……在一九零一年至一九一六年期間，神聖東正教的殉道諸聖堂就是興建在這地點上。祭台下的地下室安葬了被義和團殺害的中國基督徒的遺體。教堂的四周是墓園。一切都已逝去。

一九四五年，俄羅斯東正教在華的傳教團團長維克托爾 (Victor Sviatin) 總主教承認莫斯科宗主教的管轄權。他留任團長一職，直至傳教所一九五四年關閉為止，然後返回俄羅斯。當時，沒有人能反對拆毀東正教教堂的行動：殉道諸聖堂連同其他教堂被拆毀。這是無可挽回的損失……沒有人知道埋在地下的聖觸的命運如何。墓園亦同樣遭拆毀。另一座傳教所教堂也遭破壞，改為汽車房。世人忘記的，天主卻記得。在現時長滿青草的教堂原址上，從灰白的基石中長出了野生

的花朵。

在「文化大革命」期間，不但北京的東正教教堂，連那埋葬了中國殉道者聖觸的墓園也被破壞。今天，約有二百五十名中國東正教徒在北京居住，他們都是義和團之亂殉道聖人的親戚。直至現在，他們仍不能在教堂祈禱。北京的最後一位東正教司鐸杜立夫神父 (Alexander Du)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逝世。現時，夫中國當局有可能重開北京的東正教教堂和墓園。

聖人的紀念是現世教會的支柱，是教會運行的軸心。如果我們儲存和保持對義和團殉道聖人的回憶，便能清楚正視那些事件，並正確理解那些想法，不是從一個無禮的「文明人」，或「世界團體」的一個無恥官僚，或一個野蠻的嗜血殺手，或國務院的一個冷血殺手，或現代公立學校的一個無知受害者，或一個擁有博士學位的傻子的立場來理解，而是從真理，即殉道聖人的立場來理解。□